

卢梭文本解读方法探析

南京大学 黄小彦

摘要: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卢梭的经典名著至今仍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鉴于卢梭作品中显在的矛盾以及卢梭本人对其一致性的强调,学术界对于如何解读卢梭形成了多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思路。以卡西勒和斯塔罗宾斯基为首的一派主张从一致性的原则出发解读卢梭,而以德里达、保罗·德·曼为首的解构主义批评家则强调卢梭作品中语言修辞的价值,将卢梭的作品看成是语言的迷宫,主张从矛盾出发挖掘卢梭隐藏的思想。通过分析这两派的解读方式以及卢梭文本本身的特殊性,本文提出结合传统和当代的解读方式,摒弃传统的思维定势,将文本看作一个虚实结合的结构,从动态发展的角度以包容开放的研究态度阅读卢梭,阐释卢梭。

关键词:卢梭;解读;一致;矛盾;辩证

作者简介:黄小彦,讲师,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研究、卢梭研究。电子邮箱:xyhuang2004@163.com

两个多世纪以来,卢梭这个名字始终在学术界占有稳固的一席之地。他的作品和思想不断地被阐释,或被曲解、贬低,或被尊崇、高扬,但从未退出研究者的视野。卢梭思想的不成体系和矛盾性是困扰所有卢梭研究者的一个难题,对于究竟应当如何解释卢梭创作文本中随处可见的矛盾,学术界众说纷纭、各执己见,从而产生了丰富而多样化的阐释。若是将卢梭的文本和思想比作是迷宫的话,是否存在一条据以穿越整个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若有,它又是什么,又该如何找到它呢?这是大部分卢梭研究者思索的问题。

通过阅读卢梭的自传作品和往来信件,我们发现,作者早已预见到自己被读者误解的可能,因而,他多次强调自己在语言运用和表达方面的与众不同,并且要求读者带着这种心理预设来解读他的文本。在致埃皮奈夫人的信中,卢梭写道:“去研究我的字典吧,我的好朋友,你将会发现,我的用词很少有普通的意义,经常是我的心灵与你的心灵之间的对话,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它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说话。”(Rousseau, 1924—1934: 266)卢梭的这种不同,并非来源于他的故意设计,而是来源于他天生的独特性,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异质性,从而意图

将之传达给他人,得到他人的理解。在《忏悔录》的开头,卢梭强调:“我生来就有别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人……我至少与众不同。”(卢梭,2005:3)面对自己各种文本之中以及之间显在的矛盾,卢梭始终主张自己的思想在整体上的前后一致和连贯性,比如,他在《忏悔录》中指出:“所有《社会契约论》里大胆的言论早已写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之中;而所有《爱弥儿》里大胆的言论在《新爱洛伊丝》中早已存在。”(同上,2005:227)显然,卢梭希望读者从这种整体上的一致性出发来解读他的文本。卢梭的这些声明确实为学者提供了研究方向,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挑战。很多卢梭研究者因此都孜孜不倦地力图从各种矛盾的表象中寻找线索,以求得出对其作品在整体以及实质上一致的阐释。

从后现代的阅读理论角度来看,卢梭的这些言论无异于是一种“奴役和强权”式的导读暗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经典著作的研究和解读,作者所要表达的真实思想依然是读者不变的追寻,而“文本中由隐性问题式布展的本真意义仍是我们的唯一阅读旨趣……阅读是为了统一于作者的意志和文本的意境”(张一兵,2003:93),因此,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卢梭的过程中,会不约而同地尊重卢梭的“导读原则”,从一致性的原则出发解读卢梭。著名卢梭研究专家斯塔罗宾斯基和恩斯特·卡西勒是主张这一解读方法的代表人物。但是,在如何处理文本中显在的矛盾,从而逻辑地得出具备统一性的结论方面,两者却各具特色。斯塔罗宾斯基跳出了传统研究者的思维定势,另辟蹊径,采用纯文本的主题研究,在卢梭的《新爱洛伊丝》中找到了“帘幕”这个不断出现的关键词,揭示了作者对于透明的追求和对于障碍的排斥,并且将卢梭这种本身具备冲突性的隐蔽的心理诉求化作一条阿里阿德涅之线,贯穿了卢梭所有的作品和思想,包括文本中无处不在的矛盾。虽然是从文本本身的文字入手,斯塔罗宾斯基对于卢梭的解读却更加侧重于心理研究。相对而言,卡西勒的研究则偏重文本承载的思想,他尽可能地试图忽略卢梭文本中细微的矛盾之处,因为在他看来,“将我们在伟大思想家的著作中所遇到的一切对立与内在的紧张都解释成简单的逻辑错误,说成是真正的矛盾,这种方法毫无意义……而在这些对立之中总是呈现出一种真正的相反相成”(卡西勒,2009:153)。因此,卡西勒以卢梭关注的人类自由、幸福、尊严等问题为准绳,从整体上对卢梭的作品和思想作出了一个内在统一的评价。

由此可见,卢梭关于其作品和思想一致性的宣称并不必然带来解读方法和结果的一致性。首先,即便遵照卢梭的“导读原则”,从卢梭所有文本的整体统一性出发进行考虑,也会因切入点和关注点的不同,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比如,通过全面分析卢梭的作品,有人认为卢梭本质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有人却认为他是一个绝对的情感主义者;有人认为卢梭是一个清教徒式的道德家,有人却认为

他在道德观念上是完全浪漫主义的,等等。其次,很多研究者只专注于对卢梭单个文本或是某类多个文本的综合阐释,根本不考虑所有文本之间的整体性,其结果必然是推断出更加多样而矛盾的结论。比如,有人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得出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结论,也有人从《社会契约论》中得出他是一个集体主义者的论断;有人从《新爱洛伊丝》中所描绘的克拉朗社会中看到了卢梭对于民主平等的世外桃源的向往,并且结合《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认为卢梭是一个乌托邦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有人却恰恰从克拉朗社会的高度透明中发现了卢梭的集权主义思想……诸如此类,举不胜举。这些矛盾和分歧尤其体现在对卢梭自传文本《忏悔录》和小说文本《新爱洛伊丝》的阐释之中。再次,并非所有的卢梭研究者都重视或认可卢梭的声明。随着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对于文本的研究摆脱了以追寻作者的原意为中心的传统阅读方式,以德里达、保罗·德·曼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致力于从含糊不清、矛盾对立的言语之中探得文本的奥秘所在。卢梭所声称的其文本在语言上的独特性以及表面上的矛盾性,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理论演练的关键场所。德里达与保罗·德·曼所感兴趣的,恰恰是卢梭创作文本之中的矛盾,而非卢梭所强调的一致性。在他们看来,矛盾不再是需要被忽略和谅解的艺术家的无心之过,而是需要被用心挖掘的卢梭思想的闪光点的隐匿之处。事实上,当保罗·德·曼声称“一切阅读皆是误读”之时,文本便与作者完全地割裂开来,同时也宣告了作者和读者之间思想传递的不可能。尽管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德里达还是保罗·德·曼都对卢梭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文本学阐释。这种阐释文本的方式完全忽视文本外的因素,而是将重点放在了语言本身的寓意之上,它不仅丰富了对文本的阐释,更是文本本身的一种衍化。至于这种阐释是否符合作为文本原作者的卢梭的本意,这一点已经不受关注;或者说,解构主义者坚信,在语言修辞的迷宫中探得的路径,就是通向卢梭隐蔽思想的正确路线。再则,在后现代主义的文本解读之中,误读与正读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区分。文本在脱离作者的同时,便理所当然地获得了独立而更加丰富的生命。

事实上我们发现,相对于用理论说教的方式,卢梭更倾向于采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来表达他的观点,尤其是在其创作后期,小说、对话、书信体、散文的形式赋予了卢梭更多表达思想的自由和空间。“有多少个人物,就有多少个卢梭。”(Versini, 1968: 279) 维尔希尼在谈到卢梭的小说文本时如此说道。卢梭从不满足于从某个固定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或是发表言论。他的思想总是变动的、游移的,从而难以像康德那样形成某种具备说服力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当他从某个角度阐释思想时,在内心早已以怀疑论者的姿态,考虑从另一个角度进行阐释的可

能,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这两种方式得出的结论都是矛盾对立的。

我们认为,卢梭创作文本的这种特殊性来源于几大原因。首先,这与卢梭自身的教育情况有关。卢梭丰富的知识基本上靠自学获得,他从未接受过某种系统性的教育,没有任何系统的概念,也不受某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所左右。在《忏悔录》中,卢梭提到曾经同时阅读各种哲学书籍,如洛克、莱布尼茨、笛卡尔的作品,因其间的矛盾不得统一而痛苦,最终通过被动地遵从和接受全部思想来获得丰富的哲学知识(卢梭,2005:131—132)。因此,在卢梭的心目中不存在某种优先的思想体系,他能够以不带偏好的目光来看待不同的哲学思想,能够以平等的姿态尝试多角度的观点阐释,他的思考是无拘无束的。因此相对地,他的文本也赋予读者更加无拘无束的阐释空间。其次,卢梭在创作文本的时候,可能已经考虑到了文本在未来的存续问题。过于确定的文本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本的活力在于它的阐释空间,在于其语言所承载的丰富涵义。从某种角度来说,语言越是含蓄,意义就越是丰富,文本也就越具活力。再次,卢梭自身的思想也确实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举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卢梭的宗教观念。在致弗朗基埃尔的信中,卢梭曾经写道:“我在童年的时候因强制而信教,年轻的时候因感情而信教,成年的时候因理性而信教,如今我信教是因为我一直都信它。”(Rousseau, 1959—1995:1134)卢梭童年时因家庭原因信奉基督新教;青年时因对瓦伦夫人的爱改信天主教;到了1742—1756年期间,他的思想尤其呈现出一种双重的运动:一方面,在百科全书派的影响之下,他脱离了天主教,被哲学主义所吸引,同时伴随着一种道德上的松弛;但是,在凡塞纳的启示之下,他又突然回归,重返新教,追寻一种德性的生活。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卢梭的文本解读,并不能限于某种传统解码式的阅读或是卢梭本人的导读原则,因为在思想方面,卢梭并不致力于传达某种完全确定不变的旨意。他的旨意本身具有多种可能的涵义,我们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直接投奔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怀抱,传统的阐释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果说文本是一个虚实结合的结构,那么它依然具有需要 we 认真探索的“实”的本真,而“虚”的部分,也同样需要 we 通过后现代或其他的解释方法来阐释、补充和完成。在追寻文本本真的过程中,首先,历史的纬度是理解卢梭思想的关键,我们必须考虑到文本生成的历史环境以及卢梭本身在大环境的变化中所产生的思想上的演变;其次,一些强烈的冲击、突如其来的变革对卢梭的心理和思想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引起一些突变;再次,卢梭的主观意识和努力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卢梭本身强烈地感受到了现实的丰富性和错综复杂性,他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各种问题进行阐释。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是,卢梭努力对经验的矛盾

进行展现和超越,而不是寻求掩饰、忽略或是消除。卡西勒曾经对卢梭思想的这种变幻无穷的生命力进行了令人赞叹并深具说服力的概括:“卢梭的理论并不是一个可以将之合并入哲学史的封闭的体系,而是生命本身的财富,是情感和思想的热情节奏,一种自然的奔放的形式,是那些试图将之简化为自然方法的人所不能理解和把握的。卢梭所展现的,是不断重新推进的思想的运动,是包含所有对立和矛盾的、凝聚在人身上的自然。”(Cassirer, 1987: 13)因此,与其说卢梭的思想是矛盾的,不如说是辩证而运动的,而我们从卢梭的文本研究中得到的“实”,应该也不是局限于一元化的结论,甚至是不局限于任何的结论。我们看到,在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中,他摒弃了爱情小说中通常使用的直接通过障碍方的死亡或主动放弃来让问题消于无形的手法,而是先大胆设想丈夫、妻子和情人三者之间现实的共同生活——一种表面和睦相处的幸福生活,同时处处显露隐藏在这种三人生活之中的暗潮汹涌的危险和骚动的欲望,并且最终将冲突的解决寄托于一种符合德性的死亡,让妻子为拯救孩子的生命而幸福地死去,将拯救自身的希望寄托于未知的彼岸。在这里,卢梭要传达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婚姻爱情观、宗教观或是社会观?对此,整个卢梭研究界从未达成比较一致的结论。应该说,卢梭倾向于把问题提到现实的层面之上,以严肃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分析方法来考察冲突关系中三方的态度和精神状态,探讨可行的解决方法。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卢梭摆出的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而非断然的结论,他更多地是邀请读者对此进行思索,呼吁读者的加入。在这个前提之下,读者对于文本“虚”的部分的补充和丰富成为可能和必要。

从某种程度上说,卢梭具有一些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一方面,卢梭的文本本身隐含这样的因素,从而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阐释学的实践场所;另一方面,卢梭的解读者、卢梭文本的进一步充实者和丰富者所处的历史时期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文本的解读,不仅与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相关,同样也与读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文本“虚”的部分的完成,有赖于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而这种自由的对话和交流,有赖于文本本身的开放性。在这方面,卢梭文本自身的辩证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布朗肖曾经在《未来之书》中对卢梭文本中的矛盾和辩证做出了独特的论断,他指出,“卢梭的思想还不是思想,它们的深度、它们取之不竭的财富以及狄德罗在其中发现的诡辩色彩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它们所处的文学层次之中,它们指称着这个与文学现实相联系的最为原初的时刻,这种居先性的要求阻止它们发展成为概念,拒绝让它们具有理想的清晰度,并且每次阻止它们试图形成一种难得的系统性概括,反而是将它们投向一些极端的诱惑之中。我们永

远都感受到对于卢梭思想的一种辩证阐释的可能,从《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直至《新爱洛伊丝》中;但是,我们同时也不断地感受到,对于现时的展现以及自省的生命变异只有相对于它们处在一个无止境的冲突中才有意义。我们说是一种思想上的病态将卢梭的思想冻结在一种不变的对照之中,我可以说这种病态也就是文学,带着一种坚定的洞察力和强大的勇气,察觉了所有矛盾的意图,当我们想要思考它们的时候,它们是荒谬的,而当我们想要接纳它们时,则是无法承受的。”(Blanchot, 1959: 68—69)布朗肖的这段话精辟地指出了卢梭所表达的思想的模糊性、矛盾性和辩证性,揭示了解读卢梭的困境和可能性。

不可否认,卢梭的思想具有原初态的混沌特征,集冲突、矛盾、统一于一体,但正是由于这种原初的混沌,才令一切从“实”到“虚”的文本成为可能,并且无限丰富。原初世界的混沌诞生万物,文本亦可如此。解读卢梭,并没有唯一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它是一个对文本不断发现和创造的过程。

参考文献

- Blanchot, M. 1959. *Le Livre à Venir*. Paris: Gallimard.
- Cassirer, E. 1987. *Le Problème Jean-Jacques Rousseau*. Paris: Hachette.
- De Man, P. 1979.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 New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 1967.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Rousseau, J.-J. 1924—1934. *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 de J.-J. Rousseau*, II. Paris: Colin.
- 1959—1995. Lettre à M. de Franquières. Dans O.C. IV. Paris: Gallimard.
- Starobinski, J. 1971. *Jean-Jacques Rousseau: La Transparence et L'obstacle, Suivi de Sept Essais sur Rousseau*. Paris: Gallimard.
- Versini, L. 1968. *Laclos et la Tradition: Essai sur les Sources et la Technique des Liaisons Dangereuses*, Paris: C. Klincksieck.
- 卡西勒, 2009,《卢梭问题》(王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卢梭, 2005,《忏悔录》(陈筱卿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 张一兵, 2003,《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